

三、異床同夢的四個兄弟

臺灣話文的新

克夫先生答春霖先生：「中興六十年來，反對臺灣白話文學。不贊成！大概是說改革的需要，和應當把複雜的語言簡減爲文。（這時可就不擡槓了）沒擡槓角，和新守舊多爭執拗的臺灣話似動搖在危險的邊緣，突然產生龍虎後，隨時點燃理想的火，但撲滅又被無數慾望和等級壞壞才得成功的，字較鮮明，不知道先生的意思怎樣？」

二、迎(嗟)

即

越(靴)(希乙)(ㄞ一)——

把即字讀「嗟」，似乎倒不如另把迎字讀「嗟」。

「希乙」(ㄞ一)，也覺得莫如另一箇越字，加走尾就是嗟，「或」加走尾就是靴，希乙，慣行相混，使用的人容易下手，看的人才

(希乙)。(這(ㄞ一)越(ㄞ一)，迎(嗟)就話的本色，能够鲜明容易驅使才爲臺灣話方

然乎？，頗有說幾是靴。臺灣話文

拗(野)字似乎和抑兩者有些不同，在的拗

臺灣話的文字

的方法來成立文字。

學會意近款既定形態的篇幅。脚注：

做一箇字

負

一

X光線室

人

不是贊成臺灣白話文學，總是沒有絕對得很，而且太不肯推翻，訛音也很多！有替(移入是不能有的代替稱呼的)或者移話就可以說(以直接的)。或者說(以間接的)。出地(去)是插(插起布頭話說)。這個難題是否能帶給臺灣的白話文罷。「沒有絕對經過許多人所討論過，會得着完全的理

子「阿母仔！你阿爸的心肝有烏無！」

母「無！」

子「白賤，你誦我吸(スウ)煙會烏心肝，阿爸吸這大，怎樣心肝會烏鳥？」

不嫁啦！

母「……恁阿爸爲着尊重你的人權，聘金一錢

都無收伊，怎樣你反無歡喜？」

女「是！阿爸已然尊重我的人權，看我有起，怎樣嫁你一系誰爲我打算？」

母「曉得！你的真心，已無收伊聘金，怎樣有錢通緝你嫁她呢？」

女「那着！若是無錢通緝你嫁她厚我，怎樣你不收伊的聘金？按怎說我是嫁？都落尊重我的人權，拏我做一件廢物，趕得出門就好

了嗎？不收生不嫁啦！」

陳培豐二著

限混的界體和文言語想像和臺灣

想像和界限 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



陳培豐=著

2013年7月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陳培豐著

--1 版，--臺北市；群學，2013.7

面；公分

含參考書目；索引

ISBN : 978-986-6525-72-8

1. 臺灣文學史 2. 漢語文字學

863.09

102014357

作 者：陳培豐

總 編 輯：劉鈞佑

編 輯：沈志翰、林琪禎、黃耀進、林肇豐、蕭安凱

出 版 者：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508 號 5 樓

電話：02-22185418

傳真：02-22185421

電郵：service@socio.com.tw

郵撥：19269524 戶名：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蘇品銓

電郵：fallengunman@gmail.com

印 刷：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話：02-35012759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 400 元

2013 年 7 月 一版 1 印



本書經群學出版社「臺灣人文叢書」編輯委員會
出版審查通過

主編：

邱貴芬（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

編輯委員（依筆劃由多至少）：

蘇碩斌（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蕭阿勤（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鈴佑（群學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

游勝冠（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陳建忠（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范銘如（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李育霖（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目錄

| | |
|--------------------|----|
| 序章 『漢文「混成語」化的想像和界限 | 1 |
| 一、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的特殊性 | 1 |
| 二、「同文」下的異民族支配 | 3 |
| 三、漢字的「混成語現象」 | 9 |
| 四、折射臺灣人精神與文化面貌的文體 | 15 |
| 五、以「漢文」為分析概念的局限 | 18 |
| 六、漢文的混成現象與歷史定位 | 21 |
| 七、本書構成 | 24 |
| 第1章 『東亞漢文的「大熔爐」』 | 27 |
| 一、前言 | 27 |
| 二、日本的漢文脈絡與「帝國漢文」 | 28 |
| 三、《臺教會》雜誌誕生 | 41 |
| 四、《臺教會》雜誌的影響 | 48 |
| 五、「殖民地漢文」的誕生與意義 | 64 |
| 六、小結 | 73 |

| | |
|-------------------------------|-----|
| 第2章 『從明治體到「中國白話文」 | 75 |
| 一、前言 | 75 |
| 二、異於西方混成語結構的「殖民地漢文」 | 75 |
| 三、殊途同歸：殊事同指，異路同歸 | 89 |
| 四、從「中國白話文」出發的臺灣現代文學 | 99 |
| 五、文體想像與社會現實的落差 | 114 |
| 六、小結 | 125 |
| | |
| 第3章 「聽歌識字」的鄉土文學／臺灣話文運動 | 127 |
| 一、前言 | 127 |
| 二、開啟文體問題的潘朵拉之盒 | 128 |
| 三、普羅階級教化主導權的爭奪 | 138 |
| 四、「聽歌識字」的語言運動 | 148 |
| 五、浮上檯面的階級、現代化矛盾 | 161 |
| 六、小結 | 169 |

| | |
|------------------------|-----|
| 第4章 「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的界限 | 171 |
| 一、前言 | 171 |
| 二、「一篇多語」的分工式文體與效應 | 171 |
| 三、翻譯中凸顯的臺灣話文問題 | 184 |
| 四、難與現代翻譯接軌的臺灣話文 | 191 |
| 五、「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的異同與論爭意義 | 203 |
| 六、小結 | 219 |
| 第5章 受縛的「殖民地漢文」 | 221 |
| 一、前言 | 221 |
| 二、「殖民地漢文」詮釋共同體的成熟化 | 222 |
| 三、臺灣人專屬文體的誕生 | 233 |
| 四、漢文與日文分際的移動 | 255 |
| 五、成為國策宣傳工具的中國白話文 | 272 |
| 六、小結 | 297 |

| | |
|------------------------|-----|
| 結論 ॥ 戰前戰後的「殖民地漢文」與臺語文 | 299 |
| 一、前言 | 299 |
| 二、東亞地區的現代化與漢文的重組 | 299 |
| 三、從「殖民地漢文」看臺灣語文的發展軌跡 | 303 |
| 四、臺灣漢文的想像與界限 | 306 |
| 五、多語社會下臺語文的自助重生之道 | 311 |
| 六、同樣陷入「同文」泥淖的日本帝國 | 315 |
| 七、戰後的「殖民地漢文」與臺語流行歌曲 | 320 |
| 八、解嚴後的臺語文發展 | 327 |
| 九、低俗小眾到摩登大眾的現代版「殖民地漢文」 | 332 |
| 後記 | 339 |
| 參考書目 | 343 |
| 索引 | 359 |

序章

漢文「混成語」化的想像和界限

一、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的特殊性

臺灣在甲午戰爭後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在帝國主義君臨世界的十九世紀，日本統治臺灣乃國際政治上弱肉強食法則下的結果，本毋須大書特書；但若從文化觀點視之，這在世界殖民統治史上卻有重大意義。

基本上，十九世紀之前的殖民統治，主要是西方白種人挾歐美文化優勢，至遠方支配有色人種。而日本統治臺灣的特殊性，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皆為黃種人，且同處於東亞地區及漢字文化圈。日本是政治上的統治者，在文化上卻與被統治者共享諸多傳統文化資源，如思想上的儒教、文學上的漢字漢文與漢詩，以及音樂上的五聲音階、七五調等；因此，日本相較於被統治者並無明顯的文化優勢地位。其實殖民統治的本質在於「差異」，正因在人種、現代文明、傳統文化上存在顯著「差異」，殖民統治者方能以文明的傳道者自居，對異民族進行經濟榨取，並對其在政治上的壓抑與不平等的統治賦予正當性、神聖性。故欠缺「差異」的統治不易成立。

明治維新前，日本與當時仍為清朝領土的臺灣相仿，都以前述中國固有的學問與文明為長期仿效的對象。因此，在思索日本統治臺灣的諸問題時，無法只注重兩者的「差異」，雙方之間難以拂拭的「類似」，更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面向。亦由於這些諸多「類似」的存在，使日本治臺時在政治上的強勢地位，無法同樣反映在文化層面。

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除了文化不及政治強勢外，在地理背景上也有特殊面向。日本治臺，與「併合」第二殖民地朝鮮的情況不同。後者是對朝鮮領土進行全面支配，前者卻只是取得清朝領土的一部分進行統治。因此藉地利之便，臺灣即使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與「祖國」中國的關係仍遠比與殖民地母國日本來得親密熟悉；加上在殖民統治下，日本政府對臺灣人與「祖國」間的來往雖有規範限制，但不至於完全禁止，於是臺灣與「祖國」間的人際、商業及文化交流，在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期間從未斷絕。¹ 由於地緣因素交流不斷，殖民時期的臺灣人與中國在文化上的「類似」仍得以持續。

自 1920 年代後半，日本帝國基於政治野心不斷強化對中國的政策，使東亞文化圈之間的「類似」，進一步透過日本治臺而浮上檯面。在所謂日華親善的政策下，文化近似中國的臺灣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時與中國攀親帶故的重要媒介，而隨著邁入太平洋戰爭期，臺灣更是從帝國一隅的殖民地，躍升為地位舉足輕重的「南進基地」，成為日本欲稱霸大東亞時不可或缺的尖兵。尤其東南亞住著許多與臺灣人同樣出身大陸沿岸的中國僑民，他們在異地謀求安身立命，但在文化上仍保留了祖先的傳統與東亞漢字文化圈的生活模式。因此，

¹ 相關論述，可參見マーク・ピーティー（Mark R. Peattie）著，淺野豊美譯，《植民地：帝國50年の興亡》（東京：読売新聞社，1996）。

「漢字漢文」自然成了被賦予大東亞尖兵使命的臺灣人，在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時與東南亞華僑聯繫的語言工具。

欲精確探討日本在臺灣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首先必須跳脫「差異」（即歐美式的殖民地定義或既定印象），改由「類似」這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處東亞文化圈的角度切入，兼以前述殖民地支配具有的特殊性為出發點來考察。具體而言，為了更精準論述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除了兼顧統治者「日本」與被統治者「臺灣」兩要素，更應放眼由中國所象徵的東亞文化圈，將其文化背景視為座標軸。其中尤以「同文」的存在最不可忽視，因為臺日雙方的共同文化遺產「漢字漢文」，對這座島嶼的統治帶來的影響十分深遠。

二、「同文」下的異民族支配

漢字漢文為古代中國人發明的文字文化。其後，就像歐洲的拉丁語傳播至整個歐洲，漢字漢文亦傳播至東亞各地，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但漢字漢文為表意文字，與表音文字的拉丁語在文字特性上並不相同。秦始皇（前 259 – 210 年）鑒於中國本土民族眾多、方言殊異，為了便於統治各地，乃命李斯以古文和各國文字為基礎創造小篆，成為正式統一的文字，此即「書同文」——無論何種語言皆以相同的文字文體書寫。而漢字漢文能達成統一書記這艱鉅任務的重要因素，在於表意的漢字漢文具有極端「言文分離」的特質。²

「言文一致」是人類的理想，也是現代化的象徵；但縱使在今

²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日的現代化國家，「言文一致」的目標仍難以全面實現，漢字漢文也不例外。漢字漢文對人類來說有記述上的極限，故為求相互溝通，乃對「言文分離」進行逆向操作，將代表聲音的「言」這項要素分離、析出，而特別強調「文」的一致性來進行有效溝通。換言之，漢文正是以極端「言文不一致」的機能，為眾多相異的方言求得溝通「一致性」的文字表記方式。

極端而言，漢字漢文是著重視覺性的表記方式，以眼觀之的重要性大於以口讀之。漢字漢文將原本訴諸語音，無法互通音信的方言，透過可視化、文字化的過程，除去方言的語音要素，達到相互溝通的目的。秦始皇時統一的漢字漢文，隨即被賦予政治上的權威地位，使分散在中國各地、彼此隔絕歧異的眾多方言得以聯繫，並建構了絕對王權的統治基礎。此舉不僅讓巨大的帝國免於分崩離析，更開創出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

中華文明的全盛期，約持續到象徵西洋文明昌盛的產業革命與文藝復興的十八世紀。對長期吸收中華文明的東亞地區而言，漢字漢文特有的表意性與可視性（visibility）具有相當便利的機能。因為不受限於發音，只要能理解漢字漢文的意義，就能創作出具自我風格的漢文，也能共享誇耀世界的中華文明；同時，以自己的方式解讀漢字漢文的文獻與書籍，亦可視為一種翻譯的過程。³

日本長期翻譯中國儒教、佛教等經典，在文字上一面承襲漢字漢文的機能，一面形成獨特的自我語言文體。至江戶時期，日本的漢

³ 參考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4），頁29–40；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東京：岩波書店，2010）。

字漢文發展已臻鼎盛。為了吸收中華文明，如何將漢文翻譯成日語並與中華文明對話，正是明治維新前日本知識分子的最大課題。在中華文明的影響下，兩者間關係緊密，日本古典的文言文體，「漢文化」程度極高，幾乎就是將漢字漢文日本化的文體。不僅如此，長期以來，日本人在文字上以「類似」為前提維持「差異」，衍生出多樣的漢文解讀法，也創造出和式漢文，發明如ヰ、込、泪、辻、暎等日本獨有的漢字。對日本人而言，漢字漢文不僅是象徵身分與地位的權威財，也是生產知識的文化財，更是代表自身文化教養的消費財。⁴

江戶末期發生以否定漢字為運動旨趣的國語國字改革論爭，代表日本人對於學問的定義與知識價值的認知，在明治維新時已從中國轉向西洋。日本開始翻譯大量西洋書籍，中華文明則成為封建、陳腐的象徵；同時，漢字漢文作為權威財、知識生產財的色彩亦漸趨薄弱。對新生的日本而言，明治維新是擺脫漢字漢文的絕佳機會；但明治維新的結果反而製造大量和製漢語。為了吸收與翻譯西洋文明，日本不僅無法與漢字漢文徹底切割，還發展出包含許多漢字漢文的文體，如漢文直譯體或漢文訓讀體，進而成為現代日語的雛形。⁵

從東亞漢字漢文的歷史觀之，日本統治臺灣可謂「同文」使用者的相遇。對於以殖民統治為契機而相互接觸的雙方，漢字漢文扮演十分重要的媒介角色。甲午戰爭後，來臺擔任「國語」（指日語，以下同）教育者的伊澤修二，面臨的狀況與秦朝亟欲推行「書同文」政策時的中國本土幾乎毫無二致。

⁴ 加藤徹，《漢文の素養：誰が日本文化をつくったのか？》（東京：光文社，2006），頁211-234。

⁵ 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東京：岩波書店，2003）。

日本領有臺灣後，在島上強力推行國語教育。甲午戰爭後誇口「要讓全部臺灣人都能說國語」的伊澤修二，帶著兩百多位通譯隨行來臺，卻陷於無用武之地的困境。多語社會的臺灣宛如一個中國的縮圖，除了福建、廣東出身的閩南系、廣東系居民等擁有文字文化的漢民族外，島上尚有數個沒有自身文字文化的高砂族原住民。占人口少數的原住民同屬南島語系，卻各有各的語言，無法互通；⁶ 閩南系與廣東系的居民有漢字漢文的同「文」可勉強溝通，但同時也使用不同的「言」各自營生。在 1895 年這個時間點，臺灣島上混雜了十數種無法相互溝通的語言，思想溝通的唯一手段，恐怕只有漢字漢文。然而，在眾多語言使用者中，能運用清朝官話「北京話」者微乎其微；因此，與伊澤修二同行的北京話通譯，在臺灣島上毫無用武之地。⁷

語言不相通仍可透過筆談溝通思想，正是「書同文」的東亞漢字文化圈優勢。「沒有通譯仍可溝通事務，全乃仰仗漢字之便」，⁸ 因為漢字具有視覺上的優勢，伊澤修二得以藉由筆談與臺灣住民進行交流。對異民族的國語教育，初期採取混合主義的教育方針，即以日語／漢文對譯的方式教授，並以漢文為日本在臺灣推行國語教育的輔助手段。除了在國語教學現場的實用性，漢文之於異民族的統治也被賦予強烈的政治工具性。具體而言，漢文經常被當成「同文同種」的根據，以「文」的類似性來稀釋外來支配者的異質性，藉以合理化殖

⁶ 若林正丈、劉進慶、松永正義編著，《臺灣百科》（東京：大修館書店，1990），頁27。

⁷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73。

⁸ 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編，《樂石自伝教界周遊前記》（東京：該會，1912），頁215。

民統治的作為；日治時期，伊澤修二就常提出此等政治主張。

伊澤修二來臺前，曾以批判漢字的立場，參與國語國字改革論爭；來臺後卻開始整合日、華、韓三個地區的漢字漢語，編纂《東亞同文辭典》。由伊澤修二態度的轉變，也可窺見漢字漢文在臺灣統治上的重要性。⁹

利用漢字漢文的便利性，在日本初次的海外統治中大展身手的人，不只伊澤修二。在國語教育關係上，與伊澤修二態度對立的後藤新平也是其中之一。1901年，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為了有效進行政治統治，對臺灣住民實施大規模文化、習俗的實態調查——舊慣調查，在探訪調查各個種族時，漢字漢文也能以「筆談方式」扮演重要的溝通媒介。日本領臺之初，能在極短時間內建構出文化人類學的知識體系，漢字漢文可說功不可沒。¹⁰

漢字漢文除了用來克服多種語言間的隔閡，或統制基準的知識性構築外，也經常用在民間交流或政治運作。甲午戰爭後，與傷亡累累的戰爭形成強烈對比的，正是在部分市鎮中，臺日知識分子和樂融融吟詩唱和的場景。漢詩以臺語吟詠或以日語訓讀吟詠，在語音上無法相互溝通，但只要看到漢詩的文字，便可理解詩文之意。無疑的，以漢字筆談或互相唱和漢詩，除了可以在政治方面稍加緩和殖民統治的氣氛外，還可降低臺灣人被敵人征服時的屈辱感。¹¹

⁹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頁89。

¹⁰ 柳書琴，〈生物學統治與流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累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1（2009年6月），頁199-252。

¹¹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頁105、

其實甲午戰爭後，日本漢詩漢文的全盛時期已經消逝。但因占有臺灣這個海外領土，日本一方面以確立國語教育為殖民統治的國策，另一方面卻在報紙與雜誌設立漢文欄，在民間成立漢詩社，使漢詩風潮捲土重來。格外諷刺的是，日本人最初於臺灣創設的御用報紙《臺灣日日新報》，其漢文欄的編輯者既非臺灣人也非日本人，而是清朝著名的文人章炳麟。可見，臺灣在軍事力量或現代化的成就上雖然落後，但其「祖國」的文化遺產——漢詩漢文，卻仍是日本不得不依附的對象。

標榜內地延長主義的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正是在高唱日語至上主義的同時，卻對漢字漢文表現出極端憧憬與眷戀的例子。田健治郎在大正初期大力提倡「同化」教育，強力要求臺灣人學習日語，但他每天寫日記用的文字並非日文而是漢文。¹²除了田健治郎這種長駐殖民地的日本人外，在日本本土懷才不遇的漢詩人森春濤、中村櫻溪，漢詩文巨擘內藤湖南、久保天隨，以及憧憬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佐藤春夫等，都曾為了體會「異國情調」而造訪臺灣。儘管漢字漢文在日本本土已失去昔日光彩，卻在這個日本最初的海外領土上東山再起。

在臺灣這個新天地，漢字漢文不僅是權威財、知識的生產財、教養的消費財，更成為一種統治的手段。將日本的臺灣統治視為植基

¹² 183；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收於氏著，《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183-227。

¹² 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府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府田健治郎日記（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於與漢字漢文的深厚關係亦不為過，臺灣歷史上成立最多漢詩社團的時期並非清代，也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回歸「祖國」的時代，而是日本統治下的大正時期。¹³這個諷刺的事實，反映出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中殖民統治的特殊性。

三、漢字的「混成語現象」

隨著殖民統治的發生，統治者的外來語言與當地土著語言往往會出現主導權之爭。有關日語在臺灣對其他各種語言的打壓與造成的位階問題，許多先行研究已分別就帝國的殖民地統合、現代化、民族化等觀點，進行過探討與分析，於此不再贅述。¹⁴本論文在此試圖要提出的，是東亞漢字文化圈萌生的、獨特的「混成語現象」。¹⁵

¹³ 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慶祝活動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8–9日，頁13–14。

¹⁴ 帝國殖民地國語政策之相關研究，可參見駒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石剛，《殖民地支配と日本語：臺灣、滿洲國、大陸占領地における言語政策》（東京：三元社，2003）等。

¹⁵ 以語言學的角度，使用Creole這個概念來說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的混成現象，在定義上會有缺陷或縫隙，因此若排除Creole一詞而僅獨立使用「混成語」這個詞彙，在論述上會比較「安全」。但是為了凸顯勾連殖民統治此一歷史情境，本論文依然以Creole為背景概念。準此，相較於Creole的本義，本書Creole的使用方式類似「Creole料理」一詞中將Creole當成形容詞的用法，注重促進讀者對研究對象在性質上的理解，而高於學術上的定義。